

# 评《肃镇华夷志校注》

吴浩军

**提 要：**《肃镇华夷志》是酒泉地区现存最早的一部定型方志，其价值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只有善本存世，长期以来鲜为人知。《肃镇华夷志校注》考辨了其名称和版本，校勘、笺注 900 余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不仅为学界利用其珍贵史料进行西北史地和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也为河西地区旧方志的整理提供了一个取法近便的范本。

**关键词：**《肃镇华夷志》版本 校勘

《肃镇华夷志》，又称万历《肃镇志》。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肃州兵备道副使张愚创修；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肃州兵备道副使李应魁续修；顺治十四年（1657 年），肃州监收临洮府通判高弥高重刊。全书共 4 卷，总计 36 目，约 20 万字。此志详记酒泉历史、地理、人文、经济贸易等，于明洪武五年（1372 年）进军河西以迄万历后期 200 多年来肃州近事尤为详悉，是一部完整保存于世的酒泉地区最早的定型方志。书中《西域疆里》、《内地住牧番夷》与《属夷内附》为其重要且颇具特色的篇目。《西域疆里》记述了明代前期自嘉峪关去往西域的三条道路、沿途所经、里距、居民状况、宗教信仰、风土物产等，可补陈诚、李暹《西域行程记》之所缺，张雨《边政考》、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梁份《秦边纪略》皆予采录，即后世称为《西域土地人物略》者；《内地住牧番夷》与《属夷内附》两篇，详述肃州总镇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族属、来源、安置、迁徙、生业、风俗以及相处关系等诸多珍贵史料，为研究肃州境内及周边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及瓜沙诸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他处见不到的资料。

由于肃州在明代西部边疆的特殊地位和修志者的独特见识，《肃镇华夷志》尤其注重辖区的军戍防守，举凡城池、烽堠、边墙、墩台、堡寨、关隘等军事设施无不备载，而关于戎器、兵饷也极尽详细，如其中有不多见的守军装备中用于治疗刀枪创伤的药材名称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西部边疆兵防资料。为了防备来自于南、西、北游牧民族和西部吐鲁番以及瓦剌等的侵扰，明代在北部边疆先后修筑了大规模的防御工事，如著名的长城。《肃镇华夷志》不仅记载了辖区数次所修长城的地点，而且其长度、高度、走向以及长城的其他设施（烽堠、墩台）、防守路线、防守兵丁的配置等清楚明了。而于西部雄关嘉峪关长城的修筑起因、筹划等记载尤详。因此，《肃镇华夷志》又是研究明代长城兵防的第一手可靠资料。

明朝于嘉靖三年（1524 年）闭锁嘉峪关，将关西汉民迁至关内，瓜、沙二州为吐鲁番所据，自此旷无建置 200 余年。敦煌孤悬关外，日见衰落，莫高窟龛为沙埋，佛像亦屡遭毁坏，一片萧条。所以，留下来的资料少之又少，以致明代敦煌的历史几乎是一片空白。而《肃镇华夷志》记录了不少敦煌的资料。如关于东迁各卫的记载，有不少涉及到了当时沙州的民族、人口变迁、居民生产方式以及与周边的关系等，大大丰富了明代敦煌研究的资料和内容。这些材料的新发现将对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肃州历来是商贾云集、交易频繁的贸易中转地，即使在明代陆路丝绸之路贸易衰落后，肃州仍然有着重要的地位和频繁的贸易活动。明代弃置敦煌、退守嘉峪关以后，河西走廊西端的肃州担负起了中西贸易及使节中转的重任。《肃镇华夷志》记载，在肃州仍然

存在着大量的马匹、丝绸、茶叶、毛皮、药材、玉石等交易。肃州居住的三种“夷人”中的回回，就是滞留或专门从事贸易的西域商人；而出钱修桥铺路和修盖寺院的商人又大多是晋商。这些无疑是研究衰落时期丝绸之路贸易的宝贵材料，也是研究晋商崛起与丝路贸易、与明政府实行的盐引政策等关系的重要材料。

此志由于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有善本，在上海、甘肃、南京图书馆存重刻本缩微胶卷，以致许多古籍丛书，如《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邵国秀编《中国西北稀见方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续编》、《续修四库全书》等都没有收录，使这一珍贵方志藏于深闺无人识，不能在学术研究和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兰州商学院高启安先生早年在研究裕固族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这部志书详细记录了明中叶以后东迁的关西数卫部众的部族、首领、人口、牧居地及其变化、语言、风俗、宗教等情况，在资料的详赡、系统上，都是其他正史、野史和地方志所不能相比的，是研究裕固族不可多得的材料；加之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影印出版的《肃镇志》的流行，使许多学者以此为彼，误引误用，以讹传讹，从而萌生了将这一珍贵历史典籍发掘整理出来以惠及学界的想法。近年，他有余力完成这一夙愿，遂不避艰难，对照缩微胶卷抄录、校注，其间又邀敦煌研究院邵惠莉加盟，从2003年底开始，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实现了这一心愿。书稿完成后请敦煌研究院李正宇作序，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6月出版，书名《肃镇华夷志校注》。此著于西北少数民族研究、敦煌学研究、酒泉地域文化研究及酒泉古旧方志的整理等贡献颇巨，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

首先，此著问世，使这一尘封已久的历史文化瑰宝重见天日，为这一珍本史籍的永久保存和广泛流传提供了保障，也为学界充分运用其中珍贵的历史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是功德无量的善举。

其次，理清了《肃镇华夷志》创稿、成书及重刊的年代和纂修者，辨别了其名称和版本。长期以来，不同的方志书目既载有《肃镇华夷志》、万历《肃州志》、万历《肃镇志》，也载有《肃镇志》，各处又流行着台湾成文公司影印的《肃镇志》。由于题为前三名的志书一般人很难见到，学者们着力点又不在此，在西北史地和少数民族等领域研究中多就手头所见率尔引用，致使此志的版本演变成为朦胧混杂，甲乙互缠。高启安综合《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缪荃荪方志目》（缪荃荪于1913年编撰的《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张维《陇右方志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方志书目的著录和《肃镇华夷志》李应魁序、《乾隆重修肃州新志》黄文炜序及两志宦籍、名宦等相关条目的记载，经过深入研究后基本拨开了这一团历史的迷雾。

1.《肃镇华夷志》，创修于明嘉靖年间，其创修者为张愚。张愚，直隶天津人，进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任肃州兵备道副使（二十三年为刘瑜）。此创修稿尚未完成，张愚即升迁他任。到明万历年间，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在甘州，即今张掖市甘州区）曾经有过一次修志的举动，产生了一批地方志书。此时李应魁任肃州兵备道副使，就在张愚创稿的基础上进行了续修，使其成为完帙，并且刻印流行，仍沿用《肃镇华夷志》原名。李应魁，四川内江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进士。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以右参政调任肃州兵备副使，万历四十四年完成《肃镇华夷志》。清顺治十四年河西各镇整理、重刊了万历年间所修志书，《肃镇华夷志》即其中之一，由肃州监收临洮府通判高弥高重刊；重刊时删去了“华夷”二字，更名为《肃镇志》。目前中国国家

图书馆所藏善本即为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刻本,四卷三册。万历刻本《肃镇华夷志》目前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卷三。

2.《肃镇华夷志》名之以“镇”,起因于明代9个边镇的设置,甘肃镇为九边镇之一。明代以“镇”命名的志书较多,如《延绥镇志》、《宣府镇志》等,河西地区同一时期还有《甘镇志》、《凉镇志》、《西镇志》三部,均刊刻于顺治十四年。虽然《肃镇华夷志》所述范围为肃州卫和镇夷千户所,但肃镇之名并非肃州、镇夷之缩略。

3.顺治重刊《肃镇志》和缪目所录万历《肃州志》、张维《陇右方志录》所录万历《肃镇志》实际都是《肃镇华夷志》,现在应正其名,统以《肃镇华夷志》称之(以下简称甲本)。但近年各处又流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出版之《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本《肃镇志》(以下简称乙本)。乙本《肃镇志》为4卷。卷一地理志(沿革、山川、水利、风俗、物产、古迹6目),卷二建置志(公署、学校、坛壝、祠祀、驿传5目),卷三官师志和兵防志(军制、马政、关隘、堡寨、烽堠、戎器6目),卷四岁计志(户口、屯田2目)和人物志(乡贤、忠烈、孝行、贞节、科贡、流寓、仙释7目)。从甲、乙两本内容看,二者显然为两个不同的本子。不仅体例有较大差异,而且所记范围也不相同。甲本只叙述肃州周边,即明代“肃州兵备道肃州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地界;乙本所记范围则为明代“甘州五卫”。而翻检甘州方志,发现乙本《肃镇志》与现存顺治十四年刻本《甘镇志》,除序言落款所题撰人一为高弥高,一为杨春茂以外,其他内容完全一样。如此,乙本《肃镇志》实即《甘镇志》。

第三,此著繁简过录准确,断句标点无误,校勘精慎,注释精要详赡,符合古籍整理的规范,为河西地区旧方志的整理提供了一个取法近便的范本。全书以甘肃省图书馆藏顺治十四年刻本《肃镇志》缩微胶卷作底本,参以嘉靖《陕西通志》、《边政考》、《秦边纪略》、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光绪《肃州新志》、《甘镇志》等西北史地著作,以及中华书局本二十四史中相关正史,综合运用他校、理校等校勘法,共出校记577条。由于《肃镇华夷志》从成书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这400年来,肃州及其周边地区不仅建置沿革和社会生活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堡关隘和坛壝祠祀多所圯毁,就是一些自然地理也面目全非,故而今人利用这部旧志所面临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高启安和邵惠莉不避艰难,将此志中今人阅读有困难的词语一一理出,详加解释,出注366条(不包括《前言》36条自注)。不仅为一般读者阅读提供了便利,也藉此汇集和保存了大量与西北地区,特别是酒泉地区相关的历史地理、方国族类、人物、职官、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资料,为研究者充分利用提供了便利。其中有些条目,如交河公主,甚至不见于各种工具书。校注者引用《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作了详尽的笺释,将历史上两位交河公主的出身、经历及最后归宿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此外,体例安排合理得当,版式设计典雅朴素,简洁大方,也是《肃镇华夷志校注》一个显著的特点。正文之外,卷首置李正宇撰写的《序》,仅1100余字,即将应有之义阐发无余,可谓言简意赅之典范。《序》后是校注者《前言》,详细考证和辨别了《肃镇华夷志》的名称和版本,全面论述了它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是此著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全书附录,《校注》还收录了张雨《边政考》和嘉靖《陕西通志》所载《西域土地人物略》,方便研究者与《肃镇华夷志》中的《西域疆里》相对照,也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河西各地市陆续整理出版和印行了一些旧方志,但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存在问题

很多,其中如金塔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修编金塔方志》(2006年1月内部印行),将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高启安和邵惠莉长期从事西北史地及敦煌学研究工作,学术背景宽广,学养深厚,治学态度严谨,校注《肃镇华夷志》遵循学术规范,注释条目又多关涉酒泉及其周边地区之史地、人文。所以,此著的出版发行也为河西地区旧方志的整理提供了一个取法近便的范本。

但初创难工,后出转精,这是古籍整理和文献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肃镇华夷志》的校注虽然严格规范,但因前无古人,因而不可能没有留下遗憾和疏漏。由于海峡阻隔,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万历刻本不能见到,使该志校勘失去了一个最有价值的参本;也由于查阅图书资料的不便和付出代价的巨大,往往令从事文献研究整理的学者望而却步,不能悉数使用目前有可能利用的最佳参本校勘,产生一些情理之中的疏漏。如卷一《山川》“清水河”条,原文“城北五十里,流入讨赖河”,校记:“《新志》为‘十五’。”此《新志》按校注者所附《校勘参考著作》注明为(清)黄文炜、沈青崖纂《重修肃州新志》,《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本,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出版。限于条件,此影印本笔者目前无法核对,但曾考证《重修肃州新志》有乾隆稿本和刻本存世,其《肃州·山川》“清水河”条均作“在州北五十里”,“十五”是1984年酒泉市博物馆铅印本《重修肃州新志》整理者依据今名清水河位置所改。而明代舆图显示,清水河正“在州北五十里”。还有《景致》“金塔凌虚”条之“六十余里”,改作“九十余里”,校者也据此出校。核对校注者依据《新志》所出校记若干,可推测参校本为铅印本《重修肃州新志》,断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所收《重修肃州新志》,因为影印“稀见方志”不可能据1984年的铅印本。而该铅印本虽然“为一些读者和研究者查阅历史资料提供了方便,使这部志书发挥了一定的社会效益”,但多处篡改原文,而且“繁简过录中一些文字的误识、误用以及打印校对的错误则比比皆是”,是不足为凭的。

有些条目在文字表述的侧重点和详略方面还有可斟酌之处。如翟奎嘉靖十八年(1539年)受命巡边,历时近一年,往返3万余里,遍巡九镇,这是明代加强北部边防的重大事件,对于嘉峪关及其边墙的修筑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翟奎本人的一生也由此从低谷走向巅峰。而有关“大学士翟公”的注释却无一字及此,只是对其生平履历作了一般性的介绍。不过,这些遗憾和疏漏比起此著所取得的成就和对学界的嘉惠,都只是白璧之微瑕。

总之,《肃镇华夷志》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显著的,对于西北史地和敦煌学的研究,对于酒泉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扬和旧方志的整理,意义深远。

(联系地址:甘肃省酒泉职业技术学院教科所 邮编:735000)

本文责编:杨海峰

吴浩军:评《修编金塔方志》,《酒泉日报》2006年5月12日、18日、24日第4版。

李应魁撰,高启安、邵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校注》,第8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应魁撰,高启安、邵惠莉校注:《肃镇华夷志校注》,第32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吴浩军:《酒泉古旧方志存佚及研究整理考述》,待刊。